

中国 古代 十 大 诗 人 精 品 全 集

苏

轼

精品全集

精
品
全
集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



苏轼

● 陶文鹏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7 · 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邓绍基、周秀才、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 1997.1

ISBN 7-80612-338-5

I. 中… II. ①邓… ②周… III. 古体诗-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1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126 号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全 9 册)

邓绍基 周秀才 侯光复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36

印数:0 001~8 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刘青 宋丽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

巩明德 程萍

意设计中心

刘珍

ISBN7-80612-338-5/I·55

登记号:(辽)第 15 号

定价:160.00 元(全 9 册)

蘇東坡

丙子秋寫於京華



苏轼 像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

主 编 邓绍基 周秀才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任编辑 许文彦
装帧设计 北京羽人创意设计中心
插图绘画 王国能

《屈原陶渊明》卷	韩传达	选注
《王维》卷	黄 涛	选注
《李白》卷	管士光	选注
《杜甫》卷	严燕子	选注
《白居易》卷	谢思炜	选注
	卢永璘	
《李商隐》卷	管士光	选注
	齐元涛	
《杜牧》卷	王 宏	选注
	张斌荣	
《苏轼》卷	陶文鹏	选注
《陆游》卷	冷成金	选注

前 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以来,诗歌创作繁荣,蔚为大观,诗仙诗圣,代不乏人。其中,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和陆游,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地位和影响的十位大诗人。他们的诗名与日月同辉。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其诗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10卷9册,选编了这十位诗人的全部经典之作。若以单卷论,它收入了每位诗人一生中最重要作品,其中许多卷都是迄今收诗最多的选本。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最辉煌的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这些时期诗歌艺术最高成就的佳作名篇(本书所收入的古典诗歌作品只包括狭义或严格意义上的“诗”,不含“词”和“曲”)。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性。在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的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

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诗人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首诗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作品的写作背景和抒情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诗人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诗人“生平创作简表”和“诗作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诗人的其他选本或诗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诗作均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除屈原外,每个诗人的作品还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爱好古典诗歌的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首诗作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诗人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今后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加以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出版过程中得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韦凤娟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谢思炜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的袁济喜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苏轼的生平与创作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是北宋文学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继李白、杜甫之后的一颗大诗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他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是位大器晚成的散文家，由发愤读书而入仕。母亲程氏是位有文化明大义的女子。弟弟苏辙，字子由，是苏轼一生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同道。苏轼成长于富有文化气氛的环境中，从小就受到深厚的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接受了正统儒家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的教育，这使他“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勤奋好学，刚进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同上)。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岁时，苏轼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应试，就以他光彩夺目的才华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所激赏，并预言他将是未来的文坛巨擘。苏轼考取了进士，又在嘉祐六年通过制科考试，授大理寺

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开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他也迅即投入了这一浪潮。熙宁二年（1069），新登位的神宗皇帝（赵顼）任命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创置三司条例司，雷厉风行地推行政治革新，希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苏轼也是反对维持现状、赞同实行改革的。早在嘉祐六年的对策中，他就发表过改革弊政的议论，其后又在《思治论》及其他奏章中主张针对现实，大力兴革。但苏轼的改革思想同王安石存在分歧：王安石从变更政治、经济制度入手实行改革，苏轼却强调择吏、任人，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三》）；王安石主张理财，扩大国库收入，苏轼主张“节用以廉取”，批评变法派“广求利之门”（《策别·厚货财》）；王安石变法立说立行，认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上执政书》），苏轼则认为“欲速则不达”，建议神宗皇帝不要“求治太速，进入太锐，听言太广”（《上神宗皇帝书》）。由于以上的思想分歧，加上苏轼同韩琦、欧阳修、富弼等元老重臣有密切联系，而这些人已从庆历嘉祐时代的高唱改革变成了攻击改革的中坚人物，因此，苏轼也就同他们一起，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在王安石执政期间，苏轼主动要求外放，

先通判杭州，以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他在各地看到了新法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的一些流弊，写了一系列攻击新法弊端的奏章和诗文。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在执行新法的实践中，却能“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东坡先生墓志铭》）。他每到一地，都注意了解民情民隐，关心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曾经组织生产救灾，呼吁朝廷减免赋税，开粮仓救济饥民，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带领群众开发煤矿，还指挥了徐州军民的抗洪斗争。苏轼这些兴利除弊、为百姓谋福利的政绩，使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和热爱。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实际上表明新法因其自身的缺陷和外部阻力而失败。一些投机新法的分子热衷于营私结党、倾轧报复。耿直敢言的苏轼从此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牺牲品。元丰二年（1079），正在湖州任职的苏轼突然被捕下狱，罪名是在诗文中攻击朝廷的新法，这就是有名的“乌台（御史台）诗案”。后经亲故营救，救出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这一场卑鄙的残酷的文字狱，使苏轼的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在黄州期间，他躬耕于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庄和佛禅中寻求精神的慰藉与解脱。他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在文学创作上却获得了丰收。

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听政，

政局发生了大变动。司马光等旧党上台，苏轼被召回汴京，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他并不因为旧派的重用，就隐瞒观点，不分是非，随声附和。他反对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竟和司马光当面辩论了一场。从元祐元年（1086—1093），是旧派得势的时期。苏轼虽在中央任要职，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性格又刚正不阿，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夹攻，并陷入了朔党、洛党、蜀党在政治、学术乃至意气的无休止纷争中。他愈来愈感到在朝内难以立足，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出知杭州。此后，他在不断受到攻击与诬陷的情况下，辗转于颍州、扬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对“元祐党人”进行报复、迫害。苏轼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岭南的惠州和海南岛的儋州。在蛮烟瘴雨、遥远荒僻的海岛上，苏轼生活贫困，处境艰难，但他乐天知命，每日食芋饮水，著书赋诗，怡然自得。他还热心地向黎族人民传播文化知识和农业技术，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同当地百姓友好相处，建立了真诚的友谊。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大赦元祐旧党，他才得以北归。由于长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长途跋涉的艰辛，第二年就死在常州。

苏轼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这种宏博开放、灵活通脱的思想，使他能积极进取，热爱学问事业，中心乐之，自进不已。他处顺境时不骄情逸乐，在逆境中能够随遇而安，用乐观洒脱的态度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因此，苏轼得以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使他的坎坷境遇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并体现在他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

苏轼才气横溢，创作精力旺盛，建树了多方面的文学艺术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的新面貌；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在书画艺术方面他也是名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绘画与文同、米芾一起建立了宋代文人写意画派。他对诗文书画创作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不愧为宋代一位杰出的文艺批评家。他又知音律，深谙园林艺术，精于鉴赏吉金乐石。他涉猎的领域如此广阔，又能同时取得突出的成绩，这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在散文创作方面，苏轼是兼擅众体并独树一帜的大家。他的政论和史论，善于分析政治形势，研究治国之策，总结历史教训，反映了他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和对形势发展趋

势的洞察力。这些文章大多有为而发，言之有据，论点鲜明，逻辑严密，议论纵横，气势恢弘。苏轼在这类文章中注入饱满的政治激情，旁证博引，巧譬善喻，写得主旨集中，一气呵成，又迂回往复，波澜横生，从而使这些以性质而言不属文学散文的作品兼具说服力和感染力。《教战守》、《决雍蔽》、《上神宗皇帝书》等就是其中有名的篇章。苏轼的史论，如《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平王论》等，则在文从字顺、论辩滔滔之外，又能就常见的事实翻新出奇，从别人意料不到的角度切入，提出独诣之见，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记事散文包括碑传、游记、亭台记等，具有更高的文学价值，不乏广为传诵的名篇。《喜雨亭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韩魏公醉白堂记》、《墨妙堂记》等亭台堂阁记，打破一般先叙事、次描写、后议论的格局，三种成分按主题展开的需要而错杂使用，或表达关心稼穡、与民同乐之意，或攄写游于物外、无往不乐之心，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之节，或警示切莫以一时之得夸世自足之理，将旷观、达识、至理、深情熔于一炉，故而文格高妙，笔意澜翻，变化莫测。为人物立传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郭忠恕画赞》、《石氏画苑记》、《祭欧阳文忠公文》、《潮州韩文公庙碑》等，撇开对传主生平事迹的呆板介绍，善于借助生活片断和细节，刻画人物状貌、神态、性格，笔墨简省，却

能使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他的记叙文没有固定的套式、章法和结构，总是随“意”变化，篇篇出新。其书序类文章，写法也不拘一格，《范文正公集叙》、《王定国诗集叙》等，或叙人物，或论文学，也是为世传诵的名篇。

随笔小品文是苏轼散文中独具风韵的妙品。其文体样式主要是杂记、题跋、书简，大都作于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时期，不但数量可观，艺术上也最引人入胜。其写作特点是信手拈来，随口说出，追求自然为文，绝少藻饰，语多雅谑，饶有谐趣。篇章虽小，却耐人寻味。其中，记游的随笔如黄州时期的《游沙湖》、《记游定惠院》，惠州时期的《记游松风亭》、《游白水》等，都善于以凝炼优美的诗笔写景，往往在极不经意中便写出一种情调或一片心境。例如《记承天寺夜游》，全文八十四字，写夜游情景寥寥几笔：“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二人者耳。”展现出一幅鲜明澄澈的月夜图景，一种空渺寂寥的感受，情、景、理化合成一个令人遐想寻味无穷的诗境。前人评赞说：“仙笔也。读之觉玉宇琼楼，高寒澄澈。”（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他的书简，如《与参寥子书》、《答秦太虚书》、《与元老侄孙》、《答谢民师书》，题跋如《书临皋亭》、《书归去来辞赠契顺》、《书蒲永升画后》、《书吴道子画

后》等或叙家常琐事，或抒人生感慨，或述艺术见解，无不从性灵中流出，娓娓写来，亲切有味。它们从不同的侧面，突现出一颗历经磨难而旷放豁达、充满生活情趣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心灵，是东坡开阔的胸襟、真率幽默的性格、宏博通达的思想的升华和结晶。苏轼以其“自然超妙”（《初月楼古文绪论》评语）的随笔小品文，在提高我国古代散文的文学性、抒情性和个性化程度上起了重大作用。

赋体文发展到宋代，逐渐走向散文化。苏轼的赋在摆落浓丽词采、避免典故堆砌和成片的骈词俚句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他力图用清新优美的散文语言创造出充满诗意的境界。他的前后《赤壁赋》都以写景为主，一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字字秋色；一写“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句句冬景，在写景中抒发他对历史人物的景仰，表现他在坎坷仕途中感情的波折、挣扎和解脱，进而探讨宇宙人生的哲理，使作品兼具诗、文之长，融抒情、叙事、写景、说理于一炉，堪称宋代散文赋的双璧、光照千古的不朽杰构。苏轼又是宋代的骈文大家。他善于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作骈文，开宋代骈体的新风。总起来说，苏轼的散文既体现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共同的主体风

格,又以雄健奔放、挥洒自如为特色。正如他自己在《文说》、《答谢民师书》中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喷礴而出”,“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苏轼的词今存三百四十余首,是北宋词人存词最多者。苏词的最大特点是历来所说的“以诗为词”,这是苏轼对传统词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词的题材和境界的拓展。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从“花间”、“樽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他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通常只在诗中出现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乃至贺寿、嘲谑等等题材和内容移入词中,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概》)的境地,又能充分利用词的体式上的特点,取得诗歌所难以具有的艺术效果。最能反映其开拓创新精神的有三类题材:第一类是对自己的政治情怀和理想壮志的抒发,例如《沁园春》(孤馆青灯)写“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政治抱负;《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写持节挽弓、矢志报国的豪情壮怀。第二类是写自己面对自然、感怀今昔之际对宇宙人生的思索与探究,例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的开篇,把酒问天,今夕何年,表现出词人对永恒存在的向往。正因为

词人从宏大的时空中寻求精神的超越，故而对于月的阴晴圆缺与人间的离合悲欢，都能用一种高逸旷达的情怀去对待。全词在清凉澄澈的境界中渗透着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成为中秋词的千古绝唱。第三类是农村题材的词。在徐州太守任上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农村风光与农事生活，勾画了黄童、白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形形色式的农村人物，在北宋词史上首次展现出一幅幅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农村风景画和风俗画。这三类词作，都显示了超越前人的开创性，使宋词展现出全新面貌。

其二，掇写自我的襟抱性灵。五代宋初词，除李煜、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时有自抒情怀的篇章之外，多是由男性作者写女性柔情，供红粉歌女演唱娱宾。到了苏轼，才以词抒怀言志，更多地注入自我，多方面地表现自己的生活、情怀、个性。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抒写自己被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傲岸与高洁；《定风波》（莫听穿林竹叶声），借日常生活写自己不畏坎坷和风雨、泰然自若的人生态度；《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写出了他俯仰今古、忘机脱尘的超拔之致；《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流露出他徜徉林泉的闲适之趣；《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表达生死不渝的夫妻之情，又将自己淳厚的天性、仕